

# 互联网+制造,会给汽车行业带来啥

本报记者 张盖伦

## 两会话题

大洋彼岸传来了谷歌无人车的最新动作。3月4日《财富》网络版报道,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团队正在招聘更多有汽车产业背景的人才,这意味着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将结束试验阶段,开始产业化之路。该报道称,谷歌或与中国汽车厂商,或富士康等亚洲代工厂商合作造车。

而百度公司CEO李彦宏委员心心念念的是百度的无人车。此次他参加政协会议带来的三份提案中,就有一份是呼吁加快制定无人车相关政策法规。他建议,国家应鼓励中国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合作研发、协同创新。

而实际上,这也是诸多互联网公司布局汽车业时选择的途径,即“互联网+制造”,利用自身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与车企合作。

“汽车越来越像一种电子产品。”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研发规划部主管马力委员拿出自己的手机,“你看,手机也有外壳,但手机是电子产品,汽车也类似。电子器件在汽车上所占比重大来越大。如果是一台纯电动车,那就更加电子化了。”所以,一听互联网公司造车,马力委员毫不犹豫:“当然能造。合作是一种趋势,现代社会专业分工,他们在物联网、大数据、电子控制、导航系统等方面可能更强一些。”

在一汽集团总工程师李维斗看来,汽车越来越像一种平台,来自不同产业的技术搭载、集成在这一平台上。而无人驾驶,确实是未来的趋势。互联网公司介入汽车行业,可以和车企合作,也可以自己整合资源进行汽车制造,但不管选择什么方式,需要秉持的理念已经和过去不同——重要的不是我造一辆什么样的车,而是用户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

“传统汽车企业和互联网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他们努力的方向,是生产出能够超出用户期待、让用户尖叫的产品。”李维斗认为,“互联网+制造”不仅加上了“智能”,也加上了“用户导向”。至于未来汽

车会是啥样,无人驾驶车何时能实现产业化,李维斗坦言,技术发展速度太快,他难以进行预测。

此前媒体报道,按百度设想,无人车3年内能实现商用,预计5年将大规模量产。马力对此保持谨慎的乐观:“最近10年之内,无人车在市场上所占比例,大概也就是10%左右。”他指出,无人车在我国顺利上路可能不太容易。“有车得有路;有智能车,那得有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我国这方面还没跟上。”马力补充说,无人车与其他车辆在道路上若要“相安无事”,还需要一个全民遵守交通规则的环境,这关乎公民素质,因此道阻且长。

## 两会声音

“国家实验室一定不能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放大版’,它应该深入扎根行业、领域,具有良好的行业和学科交叉性。这样才能产生新的、更好的重大科技成果。”3月4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朋德委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从2000年以后开始酝酿国家实验室建设,最早先成立了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紧接着,2003年国家科技部批准第一批共5个国家实验室并开始筹建。2006年12月5日,科技部召开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通气会,决定扩大国家实验室试点,启动海洋、航空航天、人口与健康、核能、洁净能源、先进制造、量子调控、蛋白质研究、农业和轨道交通10个重要方向的国家实验室筹建工作。但截至目前,国家实验室基本处于筹建状态。换言之,国家实验室到底是个啥模样,尚在探索中。

在李朋德看来,国家实验室类似一种新型科研机构。他认为,以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案例参考,国家实验室应具备平台、项目、机制、体制四位一体的标配。这样的实验室,有实体、有大的国际项目、能把世界各地优秀科学家聚集起来。

“国家实验室不能只强调基础研究,也要依托行业去策划和建设;不能全是基础研究,全是高精尖的,不能脱离产业,要接地气。”李朋德说,“国家实验室机制要更灵活,不要将它拘泥在一个城市。其实,它是全国某个行业或领域中的多个优秀实验室的集成,是产业的整合。这种实验室才能带来国家的产业升级,技术的突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委员认为,行业实验室会为国家科技进步、学科交叉带来更好的支撑。“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了美国阿贡、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和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都是核领域实验室。我们曾对美国实验室做过调研,他们能源部有17个核领域实验室,大部分聚集基础性综合性研究,还有就是涉及核动力舰船和核武器、核能等。我国也应该在核领域组建实验室,加强国防力量,促进军民融合。”

李朋德希望,尽快开展新的国家实验室试点,对已建设的国家实验室跟踪与服务,关注它们的研究是否站在世界前沿,站在国家亟需上,不能一撤了之。

# 国家实验室建设必须依托行业

李朋德委员:本报记者 俞慧友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为中外记者聚焦两会。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凌晨一点多钟,记者冒着五六级寒风,在人民大会堂前等候入场采访。



中外媒体记者排队进入两会会场。



会前,外媒记者在领取政府工作报告后,第一时间阅读并发稿。

# 董明珠代表:中国制造业供给侧改革最需创新发力

“董明珠和雷军坐到一起”的新闻又一次在网上热炒。从两年前那场“赌局”开始,两位“大佬”的每次相遇从来不缺关注。但今年的董明珠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中国制造”的反思上。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传统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竞争力下降等诸多压力。“制造业”供给侧改革,企业家要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置之死地而后生。”董明珠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在中东,老外对我们说,你格力再好有什么用,因为中国制造是‘低质低价’的代名词。”董明珠谈到了“马桶盖事件”,“并不是我们没有好的马桶盖,而是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失去了信心。她搞过一个实验,把品牌去掉,让国产电饭煲与国外产品同台竞技,结果中国货胜出。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制造业确实缺乏好技术,偷工减料行为很多。国人追逐国外马桶盖,是中国制造在为以前的过失买单。”董明珠说。

去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格力的产值有所下滑。但同时,格力的市场占有率从30%上涨到近50%,利润也上升了。对于这一反一正的变化,董明珠说,中国制造的供给侧改革最需要创新发力。

“如今,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变得更大。企业如果不想被淘汰,就要敢于拿出思想,重新定位价值追求,利用创新力在供给侧发力。”董明珠说。

格力电器拥有632个实验室,累计申请专利20738项。2015年至今,平均每天有22项专利问世。董明珠说:“我们要去投入,要做给别人吃,而不是等着别人做。”

在董明珠心目中,格力未来的目标是做好高精度机床,“数控机床要求精度很高,原来我们的高精度数控机床依赖进口,我们就自主研发,争取用三年时间做到世界一流。”

这两年,格力打过一个官司。“有一个企业挖了我们的人,拿我们的专利做出产品销售。官司打了两年,赢了,法院判给我们两百万赔偿。但这两年,我们投进去的不过两百万。”这让董明珠有所体会,“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供给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的应有之义。”

最后,董明珠为“中国制造”支招,“我们不能‘坐等靠’,不能光说不干;要放开手脚,创造平台,给更多年轻人创造展示自我的机会。”(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 宽容失败必须让三种思想没有市场

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厉伟

## 投资大咖谈双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如如火如荼地展开。“创”,意味着过去没有或历史不同,失败的概率自然高一些。因此,如何看待失败,从另一个方面,检验着整个社会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

在我国,“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思想,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成功与失败的世界观。不允许失败,不宽容失败,彻底窒息了创新精神与热情。在企业经营中,最怕三种人。第一种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不知道怎么干,但你不能干错”;第二种人,表现出对组织的一片“赤诚之心”;“那些干得欢的家伙一定有私利。

## 潘建伟委员:关于“诺贝尔”,谁也无法预测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张盖伦)“咱们国家能不能实行诺贝尔战略?下决心把诺贝尔奖当成一个目标去努力,进行相关顶层思考。”5日上午的政协小组讨论上,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委员在小组发言。

郭华东委员和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委员在同小组讨论时。

## 潘建伟委员:实现大规模量子计算路还长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要进行大规模量子计算,需要从技术上同时解决消相干、粒子间相互作用精确调控和便捷的读取操作等问题。量子计算机实现从原理没问题,关键技术实现的进展。”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 民办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俞慧友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14年了,但对民办教育发展的鼓励支持并不多。一个大学生毕业,进入公办学校是事业编,进入民办学校就是企业编。看病、退休工资等都不一样。其实,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毕业生。”

3月5日,一场教育界委员分组讨论会刚开场,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副董事长许华委员第一个发言。他还没来得及完整阐述,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就抢过了话头,“民办教育中教师的待遇、校舍、地产、学生补贴等问题,从没解决过。他们的职称评定、退休待遇、编制等,无法与公办教育教师获得一致的福利。”

在俞敏洪看来,民办教育缺乏政策真正的支持,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可能被认可。他谈到了新东方在美国上市的故事。“上市之前,培训教育的公司化运作,在中国并不被认为可行。上市后这种模式才得到认可。现在,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培训公司,已达七八家之多。”俞敏洪说,“我想表达的是,民办教育做大做强了,不在乎采用盈利还是非盈利模式。但国家必须做出界定。”

俞敏洪举例,自己目前接手了一所非盈利模式的大学。大学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不拿工资。理事会监督管理,设置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机制。学生学费必须放

大政府引导基金配套资金的出资比例;再比如,对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创投基金投资于早期的创新项目,在获得收益后,政府应从配套资金收益中提出一定比例的风险奖励基金,对社会资本给予风险奖励,以弥补社会资本失败项目的损失。

早期项目创新创业,失败率较高。我建议,可以在一些地方率先设立二次创业基金。在政府产业导向支持的框架内的创新项目,如果创新失败,二次创业基金可为主要创业者提供三到六个月的基本生活费;在创业者重新创业拿到新的资本投资时,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投资基金给予优先跟投。

目前,我国经济立法正处于从审批向监管的转变

过程中,一项法律或法规的修改与出台,往往需要综合各方面意见,搜集和考察局部试行效果,并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但创新不等人。如果严格按照老的审批式法律程序办事,势必延误企业创新的时机。因此,政府必须扩大对企业创新特别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宽容度。

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的今天,不创新、不改革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风险,懒政庸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潜藏的最大危机。凡是创新与改革一定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所以,宽容失败要成为口号,更要成为全社会的具体行动措施。唯有如此,创新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发展的持久推动力。

虽然突然被“@”了,但潘建伟只是低头翻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资料,在讨论会上他也显得低调少言。

会议结束后,潘建伟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关于诺贝尔奖,很多人都在传说需要“游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可以尽可能地把本国好的科学成果向全世界推荐,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至于被同组委员指出自己有捧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潘建伟一笑:“谁也不能预测谁能得什么,我觉得只要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做好就行了。”

取操作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潘建伟表示,“如果要实现像电脑、计算机那样的通用量子计算,也许还有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路要走。”

潘建伟说,相对而言,进行某类特定计算的量子模拟机,实现起来就比较乐观。量子计算在一些小系统里面,已经可获得四体相互作用、多体相互作用的量子模拟结果。“估计3—5年,量子计算可实现对几十个粒子的相干控制,也许10年就可以实现100个左右粒子的相干控制。这样,它对某类特定计算的处理速度就可以很快了。”

在学校发展上,“只要政府监管到位,完全可以简政放权,让民办教育选择发展模式。不被束缚手脚,又能被有效约束,民办教育就一定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大学校长的行政权力不宜过大。大学行政管理,应该由教授和校长共同管理。像我们民办大学中的主要管理层干部,没有获得50%支持率,都会离开重要管理岗位。只有教师认为好的管理者,才能继续留任。这些管理者,比采取任命制的管理者,会做得更好。”俞敏洪说。

“一个缺乏监管的权力,不管老百姓干还是政府干,都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至少从目前看,从教授参与管理的实践来看,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也会想着为自己谋政策利益。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纠正这种体系中的毛病。”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委员说。(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

# 总书记三次回应 民营科技企业企业家诉求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记者杨雪)“我的发言总书记回应了三次!”5日下午,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委员在铁道大厦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昨晚一直到夜里3点半,他还在和国外的朋友讨论这件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民建和工商联界别与大家联组讨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非公经济的关怀和重视。”

4日下午的联组讨论上共有10位委员发言,陈志列得到总书记回应的次数最多。“我建议,两年举办一次民营高科技成果展和军民融合高层论坛应该一年办一次”,陈志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因为技术变化太快,这样便于军方和军工集团及时了解军民融合技术的发展,也符合世界潮流。习总书记听后表示赞同。

“当我谈到民营军工企业供货价格问题,总书记又一次回应,说他了解这个情况。”陈志列回忆,第三次是回应“大步推进军民融合”。虽然国家一直以来都鼓励军民融合,但去年年初,习总书记首次提出要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陈志列发现习总书记对很多行业细节了解得非常透彻。“习总书记一直在做记录,还不断地即时回应,我感到特别亲切。”带着振奋和鼓舞,陈志列与科技日报记者告别,匆匆往小组讨论会场走去。

工商联界别的小组讨论开始之后,昨天下午习总书记与大家互动的情形成为委员们谈论的中心议题。